

苛征、祠祀与地方利益： 元代金溪二孝女祠祀研究

吴 小 红

内容提要：唐末五代以来，抚州金溪流传着一则与炼银有关的二孝女故事，其中蕴含着彰扬孝烈的教化性文化资源、宣扬仁政的政治性文化资源和保护地方利益的经济性文化资源。二孝女祠祀以元代为最盛。世祖中后期，献利之风盛行，金溪利用该故事躲过了赋银危险。此后，在持续的银赋紧张感推动之下，二孝女祠祀不断被巩固和规范，金溪县人还在日益活跃的诸神请封活动影响之下，力争使二孝女进入祀典。但是，因元代一般不加封非祀典之神、此祠祀少有巫鬼色彩而缺乏广泛的民间影响以及其中隐含的国家和地方利益冲突，二孝女入典归于失败。这一祠祀反映了民间信仰随社会情势的变化而变化的生存和发展状态以及元朝对于笼络和整合地方社会的某种程度的漫不用心。

关键词：元代 金溪 二孝女祠祀 苛征 地方利益

民间信仰作为地域社会重要的文化象征，同时也是国家对地域社会施以影响的重要媒介和载体。但是，目前关于蒙元时期汉地民间信仰研究的成果还不多，引起学者关注的全国性或跨区域性的神灵主要有妈祖、东岳、关羽、文昌帝君、崔府君、城隍、真武等^①。

^① 目前关于元代风俗研究的两部最为翔实的著作是陈高华、史卫民合著的《中国风俗通史·元代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和游彪、尚衍斌、吴晓亮等合著的《中国民俗史·宋辽金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前者专辟两节，论述东岳、妈祖、关羽和城隍崇拜在元代的封赠、分布以及与佛、道二教的关系等情况，见该书第352—366页。后者在“民间信仰”中仅述及东岳、妈祖和关羽三神，内容较前者简略，见该书第619—621页，而将城隍与域内名山大川、名贤、儒学孔祭、医学三皇等一并置于“地方官府的祭礼”中，见该书第615—616页。最近出版的王见川、皮庆生合著的《中国近世民间信仰：宋元明清》（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专辟两章论述“跨地域信仰的形成与发展”，包括妈祖、张王、仰山神和五通四种神灵，其中张王和仰山神仅述及宋代，五通略及元代，见该书第150—205页，另有两章论述“全国性信仰的形成与发展”，包括真武神、文昌帝君和关公三种神灵，其中关于元代的内容较前后诸朝为略，见该书第206—297页。《中国风俗通史·元代卷》还略及某些行业神，如酿酒业和酒店供奉的酒神杜康、净发业供奉的罗真人和陈七子、瓦窑业供奉的瓦窑神、棉纺织业匠人崇拜的黄道婆，等等，见该书第331—332页。三书对元代民间诸神的选择反映出当时以这几种信仰最为普遍，相关史料也较丰富。

除妈祖^①有论文专述其在元代的情况,文昌帝君^②、关羽^③和崔府君^④有论文专门关注宋元两代的情况外,其余多是被置于自宋代到明代乃至清代这一较长时段中被述及,且元代的情况相对简略,形成宋、明之间的所谓“黑箱”^⑤状态。区域性的神灵中,抚州华盖山三仙^⑥、山西平遥应润侯^⑦、山西牛王广禅侯^⑧、徽州土神汪华^⑨、处州丽水诸祠庙^⑩等亦受到不同程度的关注。关于这些神灵在元代的状况,研究者的视角各有不同。侧重从国家层面探讨者,认为天妃信仰在元代的兴盛与海道漕运、海外贸易的发展有关,牛王广禅侯信仰反映了元代的重农政策,文昌帝君的盛衰与宋元战局变化、科举兴废密切联系。侧重从制度性宗教与民间信仰之关系角度探讨者,认为东岳、城隍、真武等信仰与佛、道二教密切相联,当然也与这些神灵所蕴含的王朝所提倡的道德和价值观念相关,关羽信仰的发展还得益于元代兴盛的杂剧和平话;韩明士对抚州华盖三仙的研究则侧重地方社会,兼及道教,提出了民间信仰的官僚模式和个人模式这两种模式。日本学者更注重通过区域性神灵探究元朝的诸神封赐制度以及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认为元代对民间诸神的封赐远少于宋代;对南方而言,南宋的赐额和封号是重要基础,华北地区因金朝几乎没有实施新的赐额与赐号,因而北宋末

-
- ① 陈高华 《元代的天妃崇拜》,《元史论丛》第7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37—143页;刘月莲 《妈祖信仰与元代漕运》,《元史论丛》第7辑,第144—153页。二文考察了元代对天妃的加封情况和祭祀活动,认为元代的天妃庙宇遍及从海南到直沽的沿海各地,甚至运河沿岸也有;其地位的提高与元代海道漕运和海外交通、海上贸易的发展密切相关。妈祖信仰研究,论著颇多,稍早的综合性著作请参阅李献章《妈祖信仰研究》,澳门,澳门海事博物馆,1995年;近年则有徐晓望《妈祖信仰史研究》,福州,海风出版社,2007年。
- ② 〔日〕森田惠司 《文昌帝君の成立——地方神から科擧の神へ》,梅原郁编《中国近世の都市と文化》,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4年,第389—418页。后,关于文昌帝君,重要的研究有Terry F. Kleenam(祈泰履),*A God's Own Tale: the Book of Transformations of Wenchang, the Divine Lord of Zitong*, New York: Sunny Press, 1994。
- ③ 蔡东洲、文廷海 《关羽崇拜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1年;余正松、蔡东洲 《宋元文学艺术与关羽信仰的形成》,《文史哲》2003年第4期;朱海滨 《祭祀政策与民间信仰变迁: 近世浙江民间信仰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 辟一目“宋元时期浙江省的关羽庙”,考察了浙江省的一些元代关羽庙。
- ④ 王颀 《宋、元神灵“崔府君”及其演化》,《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该文考察了宋元两代崔府君信仰的分布、其神为何人及其功能的变化。
- ⑤ 〔日〕水越知著,石立善译 《元代的祠庙祭祀与江南地域社会——三皇庙与赐额赐号》,姜锡东主编《宋史研究论丛》第8辑,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23—549页。
- ⑥ 〔美〕韩明士(Robert P. Hymes)著,皮庆生译 《道与庶道: 宋代以来的道教、民间信仰和神灵模式》,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
- ⑦ 〔日〕飯山知保 《金元代華北における州縣祠廟祭祀からみた地方官の系譜——山西平遙縣應潤侯廟を中心に》,東京,東洋文庫《東洋學報》第85卷第1号,2003年6月,第1—30页。
- ⑧ 延保全 《广禅侯与元代山西之牛王崇拜》,《山西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 ⑨ 〔日〕宮紀子 《徽州文書新探——〈新安忠烈廟神紀実〉より》,《東方學報》第77册,2005年3月,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第160—222页。
- ⑩ 水越知 《元代的祠庙祭祀与江南地域社会——三皇庙与赐额赐号》。

期的赐额、赐号价值极高，元代的新兴祠庙很难获得赐额和赐号，进入祀典；水越知还进一步认为，明初改革礼制，剥夺诸神的历代廷赐封号与个别强势信仰垄断“宗教市场”、封号道教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廷赐封号必要性的渐趋淡化有关。本文亦以地域社会为基本着眼点，以元代的财政政策为背景，以抚州路金溪县的二孝女祠祀为中心，探讨当国家和地方利益发生冲突时，民间信仰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如何被地方精英有目的地挖掘和利用，以及民间信仰背后所反映的元代国家对地方社会的控制政策。

一 二孝女故事与祠祀

金溪县位于今江西省中东部，因“溪水如金”得名，北宋淳化五年（994）建县，一直隶属抚州。唐末五代以来，当地流传着一则与炼银有关的二孝女故事。

金溪确有银矿。据现代地质调查，今金溪县城东北约1.5公里处有一处中型银铅锌矿床，银的平均品位为202克/吨，品质较高^①。唐代，此地属临川县上幕镇，长庆三年（823）设矿冶银^②。《新唐书》载临川县产银^③，很可能即出于此地。后周显德五年（958），南唐于此置金溪银场^④，后一度停废。北宋淳化五年（994），试采银矿，“利不偿费”^⑤，遂废场置县。元世祖至元（1264—1294）中后期，复冶兴采，未有所获。明永乐元年（1403），再次试采，亦无银迹。自此，银冶永废，直至21世纪，才复设现代矿场——饶家山银铅锌矿。如今，金溪城东的白面坞仍存开宝二年（969）南唐知场事王恽撰写的摩崖石刻《金溪场银坑记》195字，宝山一带则遗有深达数米、重达数千吨的矿渣和矿洞遗址8处、炉基26座^⑥。

从《金溪场银坑记》中尚可辨读的“……昊天，则九百岁而为白矾，复九百裡而银□显，复九百载而成白金”、“迁祀唐配”、“祀金银女”等文字可推知，唐末五代时期，二孝女的故事已经出现，且有祠祀。综合其他文献可知，此故事的基本情节是：银经2700年才能生成，至唐宝历年间（825—826），银矿已然枯竭；监场无法完

① 董光裕、赵志刚、罗茂金《江西省饶家山地区银多金属矿化特征及找矿远景》，《沉积与特提斯地质》2008年第4期。

② [南唐]王恽《金溪场银坑记》，系今金溪县城东宝山白面坞所存摩崖石刻，刻于开宝二年（969），2006年成为第五批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元末明初金溪人王经曾亲睹该摩崖石刻，参见王经《孝烈庙碑》，[清]王有年：康熙《金溪县志》卷一一《艺文》，北京，中国书店影印康熙二十一年（1682）刊本，1992年。

③ 《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五》，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第1071页。

④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〇《江南西道八·抚州》，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 [宋]曾巩《隆平集》卷一《郡县》，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王有年：康熙《金溪县志》卷一三《杂志·银冶》。

⑥ 蔡邦光、李宗宏《金溪县古冶炼场宝山考察记》，《江西历史文物》1982年第2期。

成贡额,面临惩处;监场二女为救父,跃入冶炉之中;此事经上报后,朝廷下令罢冶。各种版本的二孝女故事中,相异者主要集中在三处:一是故事发生的时间,有唐代、宝历元年(825)、二年(826)、宝历年间(825—826)和金溪建县以前五种说法^①;二是二孝女的姓名,有葛祐之女说和不明说两种^②;三是二孝女死后,有化银、化为金银、对化金一节心存怀疑以及认为化金纯属无稽之谈四种看法^③。故事的这些争议,尤其是姓氏问题,或可反映金溪地方势力的变化,值得考究,但本文重点不在于此,将略而不及。

此故事的蕴意主要有三。其一,银经2700年才能生成,而金溪之银在唐代后期已经枯竭,此后若再谋求复采,将难有收获。其二,二孝女舍身救父,其孝其烈,堪为楷模,祠之,可以“表孝烈,垂世教”^④。其三,自此以往,为官者若再欲开矿献银,损下益上,将有悖天理人情,从而使“贪利奸欺者有所惩”^⑤。

于是,这则故事成为一种文化资源。二孝女的孝烈之心符合历代统治者所倡导的伦理道德,是一种教化性文化资源。金溪之银已然耗尽,短期之内无法再生,这是可以使金溪从此免受银赋之扰从而保护地方利益的经济性文化资源。金溪无银而官府强取,导致二孝女之死,这是对献利者的控诉和警示,是宣扬仁政、反对苛征的政治性文化资源。显然,教化性文化资源是任何时期的统治者都乐于利用的,经济性文化资源在金溪县面临银赋危险时,可被有效地挖掘利用,政治性文化资源则在献利之风盛行时,可“俾好功献利者闻之,庶有警焉”^⑥。

二孝女投炉后,邑人立祠奉祀^⑦。北宋嘉祐年间(1056—1063),县尉林俛改创

① 元代金溪县学教谕胡元增认为故事发生在金溪建县以前,金溪县尹周自强称发生于唐代,崇仁虞集和金溪刘杰认为在唐代宝历元年,金溪王经认为在宝历二年,金溪周因可和查居广、饶州安仁李存、婺州兰溪吴师道、徽州婺源程文、建康上元杨翻等人均记载故事发生在宝历年间。相关资源来源参见后文各人与二孝女有关的诗文。

② 胡元增、王经、刘杰认为二女子“姓名无征”,周因可、李存、虞集、周自强、程文、杨维桢、吴师道、杨翻等人均认为二女子为葛祐之女,查居广和明代金溪人王英则认为二女子为葛某之女。

③ 王经认为二女“化为黄白”,杨维桢、贡师泰、程文、罗徽等人均载二女子死后“化为双白银”,李存对化金一事心存怀疑而姑从危素的“化银”之说,吴师道称,“或称投身化银,又谓死后金不复产,是皆欲见其异而未究其实者”,即不相信“化银”一事。

④ [元]胡元增《孝女祠序》,王有年:康熙《金溪县志》卷一一《艺文》。

⑤ [元]吴师道《吴正传先生文集》卷一三《金溪孝女庙记》,《元代珍本文集汇刊》本。原标题中,“孝”作“李”,笔者据正文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正之。

⑥ 吴师道《金溪孝女庙记》。

⑦ 元代虞集、吴师道二人称邑人祠二女于通禅寺,李存、程文等人则泛称“祠于佛寺”,王经认为“祠在东岳行宫之前山,号‘金溪二女祠’”;明人黎喆修府志,清人王有年修县志时,则称“石溪二女庙”。[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三〇《孝女赞》,《四部丛刊》本;吴师道《金溪孝女庙记》;王经:《孝烈庙碑》;[明]吕杰、黎喆:弘治《抚州府志》卷二五《祠祀·金溪县·二孝女祠》,《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本;康熙《金溪县志》卷一《坛壝祠庙》。

烈女庙，南宋嘉泰三年（1203），知县张元观改迁于兴国寺中，称孝女庙^①。元初，二孝女祠仍托于僧舍。此后的元代，二孝女祠六经重建或修葺，分别是大德二年（1298）县丞吴瑾在旧冶场建新祠^②，延祐七年（1320）知县李有修葺祠宇^③，至正元年（1341）县丞尹大鹏倡议修之^④，至正七年（1347）知县周自强改建，至正（1341—1368）中期县丞兰自存“复即故址建祠”^⑤，至正后期知县王守正在旧滓堆重建新祠^⑥。明代，二孝女祠三经鼎建，分别是洪武年间（1368—1398），县主簿刘志民迁址重建；正德年间（1506—1521）知县杜表重修，并奉江西巡抚孙燧牒文，在每年八月二十九日致祭；万历年间（1573—1620），知县沈麟祥又重建^⑦。进入清代，县民葛子先捐建专祠^⑧，道光三年（1823）邑士杨謨修墓树碑^⑨，道光二十三年（1843），金溪县建贞孝节烈总坊和总祠^⑩，二孝女名列其中，由官府春秋两次致祭。

由此，自两宋至清代，二孝女祠祀一直受到地方官府的支持。但是，不同时期，该祠祀所受重视的程度颇有差异。两宋时期，二孝女祠宇仅一建一迁，且间隔一百多年，似属可有可无。元朝不足百年，二孝女祠六经修葺，显然是不可或缺的祠宇。明清两代六百年，仅有四修，亦不甚被看重。此外，与二孝女祠祭直接相关的单篇诗文中，两宋未见一篇，元人所作的有十余篇，明清两代则只寥寥数篇。显然，二孝女祠祀以元代为最盛。

那么，元人为何最重二孝女祠祀？他们究竟想从二孝女故事的文化资源中获取什么？又是怎样利用这些文化资源的？下文将予以分析。

① 王经 《孝烈庙碑》。

② 胡元增 《孝女祠序》。

③ [元]周因可 《孝女祠记》，[清]程芳、郑浴修等：同治《金溪县志》卷三三之四《艺文志二·文征·记》，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清同治九年（1870）刊本，1989年。

④ 吴师道 《金溪孝女庙记》。

⑤ 王经 《孝烈庙碑》。

⑥ [元]刘杰 《重建孝女祠记》，王有年：康熙《金溪县志》卷一一《艺文》。刘杰原文并未明示王守正建祠时间，但该文作于其元末居于河南之时，文中自称“前集贤学士、资善大夫”。至正二十五年（1365）八月，刘杰由延安路总管迁任秘书卿，仕至集贤院学士。元末，刘杰因忤旨致仕，养病于河南宜阳。故该文当作于至正末期，此时金溪由朱元璋势力控制。[元]王士点、商企翁编，高荣盛点校：《秘书监志》卷九《题名·秘书卿》，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64页；吕杰、黎喆：弘治《抚州府志》卷二三《人物三·乡贤·刘杰》。

⑦ 王有年：康熙《金溪县志》卷一《坛壝祠庙》。另据同书卷三《名宦·孙宣》：正统六年（1441），浙江余姚人孙宣任知县时，“缮完忠臣孝女祠”。此“孝女祠”不知是二孝女专祠，还是忠臣孝女合祠。

⑧ 程芳、郑浴修等：同治《金溪县志》卷七《建置志二·坛祠·唐孝烈二女祠》。

⑨ [清]杨謨 《修唐孝烈二女墓碑》，程芳、郑浴修等：同治《金溪县志》卷三三之五《艺文志二·文征·碑》。

⑩ 程芳、郑浴修等：同治《金溪县志》卷二九之一《人物志十一·烈女》；[清]杨士达 《金溪新建贞孝节烈总祠碑记》，同治《金溪县志》卷三三之四《艺文志二·文征·记》。

二 元初献利之风与二孝女故事的利用

查宋代文献,两宋时期,除庆历四年(1044)抚州上贡金溪县所得重达324两的生金山外^①,金溪再无出产金银的记录。可见,整个宋代,金溪县民没有银赋之累。再查两宋金溪乡贤,包括始终将金溪县政萦绕于心的陆九渊等人的文集,未见二孝女的相关记载。目前仅知南宋景定《金溪县志》和宋代抚州郡志可能载有二孝女的相关内容^②,但检索残存于《永乐大典》中的景定《抚州志》,尤其是可能记载二孝女祠祀的“庙祠”、“古迹”等部分,未见片语提及。这固然与《永乐大典》的缺佚有关,但二孝女祠长期寄托于僧舍,金溪乡贤亦不表诸文辞,故“庙祠”不予专门记载属情理之中。在没有银赋之累的宋代,僧舍中二孝女祠的象征性留存,当源于其中所蕴含的彰扬孝道的教化性资源。

进入元代,至元十三年(1276),元军进入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富庶的南方大部转归元朝统治,随即成为元朝的财赋重区,税粮、商课、金银等源源北运。即便如此,元朝仍因海外远征、对西北宗王的战争以及巨额的诸王赏赐等原因而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为此,世祖相继任用阿合马、卢世荣和桑哥三位擅长理财者广辟财源。三人前后秉持大权达二十余年,各类田粮理算、逋负追征、和雇和买、劳役征发层出不穷。上风下效,许多地方官员亦汲汲于觅利邀功。在此背景下,南方献利之风颇盛。如分宁县(今江西省修水县)人商琼于至元十四年(1277)诱湖南淘金工至隆兴路(治今江西省南昌市)丰城县淘金,淘得黄金4两,江西行省遂设淘金场,而以商琼为场官^③。再如南宋赣州通判尹应元在元初沦为一介编氓后,于至元十九年(1282)建议把江南各处贡土庄田和学田收归官有,换得长江县尹一职^④。而江西行省建昌路(治今江西省南城县)亦“有一路官,刻下民,媚上司,妄添数

①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九《仁宗》“庆历四年五月甲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据现代地质调查,金溪县境东部何源镇现有鲁坊金矿,为小型矿床,资源矿石总量为95千克。可见,北宋金溪上献生金山并非偶然。谭小平、陈笑涛《金溪县志》第2篇《自然环境·自然资源·矿产资源·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现状》,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年,第126页。

② 景定《金溪县志》为金溪县第一部县志,已佚。元代,仅有元末邑人王经私撰县志([明]宋濂《宋学士文集》卷三《故承直郎刑部司门员外王君墓志铭》,《四部丛刊》本),亦佚。王经作《孝烈庙碑》,论及二孝女时,称“谨按《金溪县志》”,所指可能为景定县志。另,吕杰、黎喆:弘治《抚州府志》卷二五《祠祀·金溪县·二孝女祠》称,“自宋以来,郡邑图志俱载女(二孝女——引者)失名氏”,则抚州郡志亦载二孝女之事。

③ [元]危素《危太朴续集》卷一〇《富州鬻金纪事》,《元人文集珍本丛刊》本。

④ [元]佚名编,王颀点校《庙学典礼》卷一《省台复石国秀尹应元所献学田》,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1—24页。

额”^①，令该路每年织造生熟缎匹 2250 段上缴，远远超出当地实际的生产能力。

至元（1264—1294）中后期担任抚州路总管的张国纪^②亦热衷此道，令管内各县多方觅利上献。于是，辖下的乐安县开始在小曹溪淘金，金溪县也因有人“以坑冶策献”^③而在城东宝山出现了烹炼者。二十三年（1286），张国纪献上乐安小曹所产的 100 两黄金^④，次年，江西行省设小曹金银场，原丰城淘金场官商琼转任小曹场官^⑤。《元史·食货志》所列“产金之所”与“产银之所”^⑥中，抚州均榜上有名，可能即产于小曹。

金溪距丰城不足百里，距乐安百余里，抚河可作为三县共同的对外联系水道，彼此之间消息传递通畅，故丰城淘金场设立后发生的种种事情以及乐安成功建场的讯息很容易传到金溪。金溪邑士危素在半个世纪后的后至元年间（1335—1340）记述了这些情况：

丰城金董董，取之不足以庚费。于是，虽竭力淘采，地道空虚，不克共一岁之入。琼稍患苦之，乃使人走他州，购金以实其数。久之，惧其妄觉，又诬富民地有金，掘其庐舍冢墓，劫取货贿，薪增广岁赋入，以锢其事。于是尽力掊克，请增输金至廿五两九钱重，以为己功。乡民甚恶之，而亡赖者景从日众，至三百三人焉。琼又为之请于有司，岁复其役。丰城既无金，群转走饶、信、徽、衢、婺、江、南康、蕲、黄，岁掠以进琼。琼输官而攘其赢，繇是致富。会张国纪守抚，好言利。廿四年，行省用其言，置金银场于乐安县之小曹溪，课富民淘金输官，程所入多寡而免其赋，于是尽檄取丰城淘金工往教习焉。琼益以聚敛为功，复请增金三两一钱九分六厘重，总之为廿九两九分六厘重矣。琼因求迁小曹场官，兼赋丰城金。^⑦

可见，丰城淘金场设立后不久，因地产有限，金户被迫购金充数；商琼还通过掘庐挖冢等方式，豪夺埋于地下的金银；商琼身边聚集了 300 多被蠲免了身役的无赖之徒，以办课为名，行抢掠之实，影响兼及东南主要产金地；商琼乃贪婪掊克之徒，不仅为

① [元]程钜夫《雪楼集》卷一〇《建昌路分小于抚州而杂造段匹三倍抚州工役太不均宜只依抚州例诸处凡似此不均者比附施行》，陶氏涉园景刊明洪武本。

② 据《元史》，大德二年（1298）六月，湖南宣慰使张国纪“请复科夏税，与门摊并征，以图升进。湖、湘重罹其害”。此湖南宣慰使张国纪与抚州路总管张国纪是否为同一人，尚未可知，但若将二人的经历和行事串连考察，则极有可能为同一人。《元史》卷一九《成宗纪二》，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第419页；卷九三《食货志一》，第2359页。

③ 胡元增《孝女祠序》。

④ 《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第2379页。

⑤ 危素《富州蠲金纪事》；[元]刘岳申《申斋刘先生文集》卷二《送郝右丞赴河南序》，《元代珍本文集汇刊》本。

⑥ 《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第2377—2378页，第2383页。

⑦ 危素《富州蠲金纪事》。

积功而使丰城的金赋一增再增，自己更从中剋扣，因而致富；乐安小曹设场后，商琼的势力又扩及抚州。

以上种种关于设场后的负面消息传至金溪，金溪人在密切关注城东试采活动的同时，不得不担心：一旦试采成功，银矿是否会像乐安小曹一样，亦由商琼兼任场官；金溪是否会和丰城一样，成为商琼掠夺的对象；自己是否会成为银户而像丰城的金户一样，将被迫游走各地，购银以充其数。

所幸，金溪宝山一带“烹炼逾月，不得锱铢”^①，没有找到新的矿苗，印证了二孝女故事中银矿枯竭之说。张国纪离任后，“总管赵侯友继之，独引孝女事，免金溪，且亲至其地询察”^②，后经“转闻省府，事遂寝”^③。金溪县民终于逃脱此劫。

考察元初金溪逃脱银赋的整个过程，仍存许多疑问。是谁建议在旧场兴冶？是谁在努力散布丰城、乐安设置矿场的危害？是谁翻检出二孝女故事并向总管赵友^④讲述？是谁促使赵友亲赴金溪询察以使“议者口塞”^⑤？又是谁陪同赵友巡视遍布矿渣和矿洞的宝山并使其深信银矿确已枯竭？赵友是否探看了寄托于僧舍的二孝女祠？这一切都已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无从考究。但是，可以想见，当金溪县弥漫着浓重的赋银紧张感时，民间流传的二孝女故事、寄托于兴国寺的二孝女祠，以及静静矗立在城外白面坞的南唐石刻所共同形成的金溪再无白银的历史记忆成为消除这种紧张感的最好藉口，加之试采失败的现实，遂使金溪顺利度过了元初的这场赋银风波。可以说，正是二孝女故事中的经济性文化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帮助金溪成功抵御了来自官方的苛征。

三 赋银紧张感与二孝女祠祀的稳固

元代主要实行以银为本位的纸钞制度，又大量以银锭赏赐勋贵，使白银在元代的重要性大大强于宋代。而始终未能有效解决的财政困难使元廷长期面临开辟财源的压力，加之各地持续不断地传来各种坏消息，终元之世，金溪县民的赋银紧张感始终无以消除。

首先，元中后期，元帝多次发布诏书，要求“侥幸之徒妄献田土、户计、山场、

① 胡元增 《孝女祠序》。

② 吴师道 《金溪孝女庙记》。

③ 胡元增 《孝女祠序》。

④ 关于“赵侯友”，仅见诸吴师道《金溪孝女庙记》。原文是“府尹张国纪赋银属县，总管赵侯友继之。”通常，“赵侯友”当姓“赵”名“友”，“侯”乃对其官员身份的尊称。如果文中“侯”系尊称，则“张国纪”当作“张侯国纪”。吴氏笔下，张国纪属被批判者，“赵侯友”则不是，本文姑认为“侯”系尊称。

⑤ 吴师道 《金溪孝女庙记》。

窑冶，生事扰民，悉皆禁止；犯者，以违制论”^①。屡发诏书的事实说明妄献之举一直未能禁绝。因此，金溪城东的旧银场一直存在着复冶的危险。

其次，已经兴冶的金溪周边各地矿场，景况日见糟糕。乐安县小曹金银场先是不产金，改为银场，“未几矿竭，遂浮办于夫，而民病矣”^②。至大四年（1311），江西行省右丞郝天挺遂建议“小曹银场无银，当罢”^③。但直到元统时期（1333—1335），此场仍祸害一方^④。至元二十一年（1284）设置的江西行省瑞州路（治今江西省高安市）上高县蒙山银场八年后已是“民力日困”^⑤，“每岁办纳不前，往往于民间收买回炉，销炼解纳”^⑥。与金溪相距不远的饶州路（治今江西省鄱阳县），“产金，常课外，官吏并缘侵渔”^⑦，路治所在地鄱阳县“赋金，非云南叶金则不堪。民患之”^⑧。同属饶州路的乐平金户“金场日负畚鍤求金，无可得。吏并缘渔猎，民不胜苦”^⑨。虽然《元史·食货志》称元初对山林川泽之利征以赋课，是“因土人呈献，而定其岁入之课，多者不尽收，少者不强取”^⑩，但实情是，元初的献利者多有虚献妄增之举。至元三十一年（1294），江西行省官员称省内“银场岁办万一千两，而未尝及数，民不堪”^⑪。可见，当时江西行省境内的许多银场都存在着难以如数完纳的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在财政压力之下产生的这些虚献妄增的赋课长期遗祸当地。所谓“长期遗祸”，是指“国有常额，难议除豁”^⑫。由于元代财赋的处置权集中于中央，地方官府征税之责甚重而机动处置之权甚微，“区区一个税额名目的调整，都要由县官逐级禀告路、行省、都省，甚至需要动用皇帝诏旨解决问题”^⑬。因此，不论是临时性的赋税蠲免，还是永久性的常课除豁都极难。对于已经确定下来而必须完纳的金银之赋，如果后来确无矿源，则以其他方式弥补。首先是由冶户多方购求，以充其

① [韩] 韩国学中央研究院编《至正条格》卷二六《条格·田令·妄献地土》“元统元年六月初八日”条，首尔，韩国学中央研究院影印元刊本，2007年。该条前还有“大德八年正月”条、“至治三年十二月初四日”条，内容相近。

② [清] 许应鏞修，谢煌纂：光绪《抚州府志》卷一三《地理志·物产》，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光绪二年（1876）刊本，1975年。

③ 刘岳申《送郝右丞赴河南序》。

④ 虞集《孝女赞》：“皇元至元中，郡守张国纪用献利者言，起金银冶属县。至今（元统时期——引者）民病之。”元代抚州下属各县中，只有乐安一县有金场或银场，故所指为乐安小曹。

⑤ 《元史》卷一七《世祖纪十四》，第358页。

⑥ [元] 许有壬《至正集》卷七五《蒙山银》，《元人文集珍本丛刊》本。

⑦ [元] 吴澄《草庐吴文正公全集》卷三七《元故嘉议大夫饶州路总管赵侯墓志铭》，乾隆二十一年（1756）万璜校刊本。

⑧ [明] 姚鸣鸾、余坤等：嘉靖《淳安县志》卷一一《人物·儒林·吴墩》，《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

⑨ 吴澄《草庐吴文正公全集》卷四二《知茂州事叶君墓志铭》。

⑩ 《元史》卷九四《食货二》，第2377页。

⑪ 《元史》卷一八《成宗纪一》，第387页。

⑫ 许有壬《蒙山银》。

⑬ 李治安《行省制度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83页。

数,如前述丰城“购金以实其数”,瑞州蒙山银场“往往于民间收买回炉,销炼解纳”。这样往往导致冶户不堪重负。加之元代户计世袭,至元二十七年(1290)以后又再未进行大规模的户口登记,无矿可采的冶户遂不能通过转为其他户计而选择另一种生存方式,他们只能逃离徙散。蒙山银场后来便是“逃移者众,连年亏兑”^①,而丰城金户亦是“所存无什一”^②。随着冶户的日益逃散,金银之赋越发难以落实。其次,冶户逃散后,地方官为完成赋额,往往“令椿配百姓包纳”^③,即转由其他税户承担。承担的方式各有不同。饶州路乐平金场无金后,即“验田租赋金”^④,而该路的总体情况是“郡以土产贡金,视人户资产为高下。岁久,贫富不常,贫者多仍旧额,富者一无所增”^⑤。可见,饶州路是将金赋折算后,由民户据资产(主要是田赋)多寡承担。丰城则将金课直接摊派于部分阡陌细民。这些人户家毁人亡后,又“根连其宗族,蔓延其姻党。亦窘乏,至杀子女以拒”。后,胥吏“乃抑令五乡廿七都之役于官者代输之。乡曰里正,里正富民,莫肯代输者。都曰主首,力微弱,又多贫窶,故代输者皆主首尔。凡金一两重,费至元钞多至百廿贯,总之为钞三千六百贯矣,因之破家者又比比有焉。于是民之荼毒有不可胜言者矣”^⑥。三是将金银额转由其他矿场承担。瑞州蒙山银场700锭课额中的300锭后来即改由湖广行省兴国路(治今湖北省阳新县)上输,名曰“协济煇办”^⑦。

由此,元初的虚增妄献之利一旦被国家采纳而成为常额,不仅祸害一时,祸害金银户,还将长期祸及当地甚至其他地区的各类人户。如江浙行省建德路(路治在今浙江省建德县境内)那样在置金场两三年之后即由行省官员介入而得以免除金课者,在元代属于特例^⑧。金溪县人王杰对献利者的这类“作俑有自,流毒无穷”之举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贡额岁定以为常而不可削,不足则迫取于吏民以充之,其患害岂有穷乎?”^⑨

鉴于以上从周边矿场不断传来的坏消息以及对设立矿场危害的清醒认识,金溪人的银赋紧张感始终无法消除。但是,世祖后期,抚州长期处在元军镇压闽西抗元斗争的前线,江西行枢密院的步军还一度驻扎于抚州^⑩,当地的军事形势一直比较紧张。

① 许有壬《蒙山银》。

② [元]黄潜《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六《翰林侍讲学士文安揭公神道碑》,《四部丛刊》本。

③ 《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洞冶·民户淘办金课》,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影印元刊本,1998年。

④ 吴澄《知茂州事叶君墓志铭》。

⑤ 黄潜《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三一《正奉大夫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王公墓志铭》。

⑥ 危素《富州燭金纪事》。

⑦ 刘岳申《申斋刘先生文集》卷七《江西换住平章遗爱碑》。

⑧ [元]何梦桂《潜斋先生文集》卷九《建德路罢金课记》,清顺治十六年(1359)何令范重修本。

⑨ 刘杰《重建孝女祠记》。

⑩ 《元史》卷八六《百官志二》,第2157页。

金溪人尽管对二孝女心存感激，尚无暇顾及修建二孝女专祠。成宗继位后，奉行“重简守成”之政，抚州恢复清平。这时，成宗诏令“州县前代义夫节妇，议与旌表”^①。县丞吴瑾应诏而动，将二孝女祠迁出僧舍，另建新祠。以此为契机，元中后期，二孝女祠六经修建，其中颇有民间的“贫者献力，富者荐资”^②，从而使二孝女祠成为元代金溪县修葺次数最多的公共建筑，相关祭祀活动也日益常态和规范。首先，二孝女祠宇由元初的托于僧舍，大德（1297—1307）时期的“堂三间”^③，到至正（1341—1368）中期变为“中为栖神之堂三间，翼以两庑，夷涂布石，穹门严扃。旁延飞檐，以居乎奉祠者”^④，祠宇的规模日益宏敞。其次，从大德到至正，先后有县学正胡元增创“迎享送神词”三章，江阴（今浙江省绍兴市）杨维桢（1296—1370）制《金溪孝女歌》^⑤，上元（今江苏省南京市）杨翮作《金溪县孝女庙乐歌》^⑥，邑乡贡进士王经写“迎享送神诗”三章^⑦，“俾金溪之民岁时歌之，以祠孝女”^⑧，其祭礼日趋规范。复次，二孝女祠由最初的僧人代管，元中期的“门其外置钥焉，责之祠旁之居者谨视之，不使褻慢得至其庭”^⑨，到至正中期有专门的屋宇“以居乎奉祠者”^⑩，祠宇管理日渐严格。又次，元中后期，金溪“民间岁时祠之”^⑪，二孝女成为常态的祭祀对象。还有，二孝女故事的要素日形丰富，情节愈益生动。明人这样描述二孝女故事的演变“自宋以来，郡邑图志俱载女失名氏，元朝胡元增《记》亦不言有名氏。延祐以来，周因可、周自强《记》，遂言其名氏及事实甚详，不知何由而知也。至于李存《记》，又谓二女跃入炉中，顷之，各化为银，又不知何由而考也。”^⑫最后，二孝女故事由南宋后期的流传不甚广，到元后期成为南北诸多文宗硕儒咏歌的对象，其影响范围日形扩大（此待后文详述）。

可见，由于金溪官民的一系列运作，到元后期，二孝女祠祀已然稳固且规范。但是，参与者对二孝女祠祀的着眼点有所不同。县丞吴瑾认为二女子“有大于义夫节妇”^⑬而建祠，县尹李有有意图于“旌劝邦人，风励来者”^⑭而修祠，知县周自强因“宣

① 胡元增 《孝女祠序》。

② 王经 《孝烈庙碑》。

③ 胡元增 《孝女祠序》。

④ 王经 《孝烈庙碑》。

⑤ [元] 杨维桢 《铁崖先生古乐府》卷六《金溪孝女歌》，《四部丛刊》本。

⑥ [元] 杨翮 《佩玉斋类稿》卷一〇《金溪县孝女庙乐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⑦ 王经 《孝烈庙碑》。

⑧ 杨翮 《金溪县孝女庙乐歌》。

⑨ 周因可 《孝女祠记》。

⑩ 王经 《孝烈庙碑》。

⑪ 虞集 《孝女赞》。

⑫ 吕杰、黎喆：弘治《抚州府志》卷二五《祠祀·金溪县·二孝女祠》。

⑬ 胡元增 《孝女祠序》。

⑭ 周因可 《孝女祠记》。

化者责”^①而葺祠，县丞兰自存以“嘉二女孝烈，复即故址建祠”^②，县令王守正“首政以表孝烈为务”^③而重修祠。地方官员们看重的显然是二孝女祠祀中的教化性文化资源。而金溪故老胡元增更强调二女子“生此邑民于世世”^④，邑人王经还进一步分析了二孝女的“罢场废冶之功”：“矧坑冶未废之先，是邦之民，贫富举疲于奔役，未闻其以学行者。迨化金弛贡之后，山川灵秀，萃美于人，而民生其间者，咸涵煦于富完安乐之泽。故王文公（王安石——引者）及我‘三陆’（陆九韶、陆九龄、陆九渊——引者）诸君子钟其间气，蔚为儒宗，迄今俗化彬彬然与齐鲁齿。”^⑤王经突出了弛贡对金溪县百姓安居、风俗淳美、人文辈出的影响。邑士刘杰还说“自古君臣以利为国者，卒不能逃后世公论也。观二女事，亦当知所惧矣。”^⑥显然，胡、王、刘等金溪县民更注重二孝女祠祀中保护金溪免受银赋之扰的经济性和宣扬仁政、反对苛征的政治性文化资源。

四 县人努力与二孝女入典的失败

元朝对祭祀有相关规定，“其天子亲遣使致祭者三：曰社稷，曰先农，曰宣圣。而岳镇海渚，使者奉玺书即其处行事，称代祀。其有司常祀者五：曰社稷，曰宣圣，曰三皇，曰岳镇海渚，曰风师雨师。其非通祀者五：曰武成王，曰古帝王庙，曰周公庙，曰名山大川、忠臣义士之祠，曰功臣之祠，而大臣家庙不与焉”^⑦。以上祠祀，部分有官员的参与和官府财力的支持^⑧，多数为民间行为，但都属于“载在祀典者”。同时，有鉴于民间赛社作会时，“鸠敛钱物，聚众妆扮，鸣锣击鼓，迎神赛社，不惟

① [元]周自强《孝女图记》，王有年：康熙《金溪县志》卷一一《艺文》。

② 王经《孝烈庙碑》。

③ 刘杰《重建孝女祠记》。

④ 胡元增《孝女祠序》。

⑤ 王经《孝烈庙碑》。

⑥ 刘杰《重建孝女祠记》。

⑦ 《元史》卷七二《祭祀志一》，第1780页。

⑧ 从笔者所见文献分析，“天子亲遣使致祭者”、“代祀”、“有司常祀者”三类，均有官员的参与和官方财力的支持。“非通祀者”中，只有部分祠祀有官方的参与和财力支持，如“神农、高辛已上，系圣帝明王，及三代开国之主，皆以功及万世，泽被生民，故历代载于祀典，礼未尝废，拟令所在官司三年一祭，拟支钞不过二十两。微子〔归德府录事司〕、留侯张良〔彭城县〕已上，系自古忠义直烈、仪刑后世、赞扬风化者，故历代载于祀典，所以激励人臣，使知景（疑原文此处有阙文——引者），拟令所在人民岁时致祭”。见《元典章》卷三〇《礼制三·祭祀·祭祀典神祇》，〔〕内为原文小字夹注。另据同卷《霖雨不止享祭》、《祈风雨不得支破官钱》两条，出现灾情时，地方官员可以祭祀那些平时官方不参与而只由民间祠祭的诸神，但不得支用官钱，这类官员因灾祷祭之神当也在祀典之中。由此，“非通祀者”中只有少数“古帝王庙”由官方致祭，绝大多数的“古帝王庙”、“名山大川、忠臣义士之祠”和“功臣之祠”由民间祭祀。

枉费资财，又且有妨农务，或因而别生事端”^①，以及“男女混淆，启恶召奸，伤风坏俗……中间倘有乘间窃发，或为奸盗，或构异谋者”^②，元代禁治民间的“祈神赛社”、“唱词聚众”等活动^③。史料显示，金溪县二孝女祠虽有地方官员主持修葺，但官府是否出资，不得而知，且地方官员似未参与祭祀活动，是“民间岁时祠之”。由此，已然常态化的二孝女祠祭随时面临禁断的危险，惟有将其载入祀典，才可获取长久保障。金溪县民对此耿耿于怀。至正七年（1347），知县周自强至二孝女祠东，“父老指示新庙即故废炉地，败矿班班尚存，以未载祀典为今日阙事”^④。邑士刘杰亦说“褒封之典犹缺，岂非有待于今日乎”^⑤。

金溪父老期待二孝女的褒封之典，并非空穴来风，这是在元中期以来民间日益活跃的诸神请封活动推动下自然形成的念头。

中统元年（1260）三月，忽必烈在开平（即后来的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境内）即皇帝位。四月，宣布“当临御之始，宜新弘远之规。祖述变通，正在今日”^⑥，决定参用汉制。承认并延续中原旧有的祭祀传统，是其举措之一。《元典章》收有以下条画“庚申年（中统元年——引者）四月，钦奉诏书，内一款‘五岳四渎、名山大川、历代圣帝明王、忠臣烈士，载在祀典者，所在官司岁时致祭。’”^⑦攻占南宋都城临安后，元廷又颁布诏书“至元十三年二月，钦奉平定江南诏书，内一款‘名山大川、寺观庙宇并前代各人（‘各人’当作‘名人’——引者）遗迹，不许毁拆。’”^⑧这些保护寺观祠宇的措施有利于稳定新近占领区。随着社会渐趋安定，至元二十八年（1291），元朝始加封五岳、四渎和四海^⑨，以强化天下一统和系出正统的观念。至元三十一年（1294），成宗继位之初，即规定“名山大川、圣帝明王、烈士，载在祀典者，所在长吏除常祀外，择日致祭；庙宇损坏，官为修理”^⑩，延续了世祖以来的承认和接受旧有祭祀传统的政策。

同时，世祖、成宗两朝的40多年间，还加封了一些神灵。粗略检索《元史·本纪》，除岳镇海渎外，两朝加封的“名山大川、圣帝明王、忠臣烈士”有昔木土山神和泉神、回水窝渊圣广源王、常山灵济昭应王、安丘雹泉灵霈侯、崔府君、妈祖、伯

① 《元典章》卷五七《刑部十九·诸禁·禁聚众·祈赛神社》。

② 《元典章》卷五七《刑部十九·诸禁·禁聚众·禁治聚众作会》。

③ 据《元典章》卷三〇《礼制三·祭祀·人病祷祭不禁》，因病“赴寺观庙宇祷祭之类不在禁限”，也许这些因病被祭之神可以超越祀典的范围。

④ 周自强《孝女图记》。

⑤ 刘杰《重建孝女祠记》。

⑥ 《元史》卷四《世祖纪一》，第64页，中统元年四月辛丑即位诏。

⑦ 《元典章》卷三《圣政二·崇祭祀》，“庚申年四月”条。

⑧ 《元典章》卷三《圣政二·崇祭祀》，“至元十三年二月”条。

⑨ 《元典章》卷三《圣政二·崇祭祀》，“至元二十八年二月”条。

⑩ 《元典章》卷三《圣政二·崇祭祀》，“至元三十一年四月”条。

夷、叔齐、小清河神、桑乾河神、解州（治今山西省运城市）盐池神、浙西盐官州（治今浙江省海宁市盐官镇）海神、吴大夫伍员、真武等^①，以北方神灵为多。这与中原的稳定期较江南更长有关。随着世祖、成宗之交江南社会步入稳定期，以及岳镇海渚的封祀和地方官员祭祀辖境内的部分在典神灵所起的榜样作用，南北各地的民间祠祀日渐活跃，请求封赐诸神的活动随之增加。其最终体现就是至大四年（1311）正月诏书。

至大四年正月初八日，武宗海山驾崩^②。三天前，武宗颁布诏书：

至大四年正月初五日，钦奉祀南郊诏书，内一款“岳镇海渚，已议加封，遣使致祭。其路府州县名山大川、圣帝明王、忠臣烈士，凡在祀典者，各具事迹申闻，次第加封；除常祀外，主者施行，严加致祭；庙宇损坏，官为修葺。”^③

武宗登位，原是忤逆了阴阳术士的预言^④；在位期间，其对诸神加封亦不甚措意。驾崩前的这通诏书是否有求邀冥佑的目的，不得而知，但对民间的诸神信仰而言，该诏书确是“契机”^⑤。此前，元廷只明确允许官民祠祀在祀典之神而没有允诺加封诸神，频次不多的加封当是根据特定目的酌情赐予，如妈祖加封源于南北一统之后元廷对沿海航运的倚重和海外贸易的拓展^⑥，盐官州海神加封与大德时期（1297—

① 《元史》卷六《世祖纪三》，第113页，至元四年（1267）正月，“癸丑，敕封昔木土山为武定山，其神曰武定公；泉为灵渊，其神曰灵渊侯”。卷九《世祖纪六》，第192页，至元十四年（1277）七月，“回水窝渊圣广源王加封善佑，常山灵济昭应王加封广惠，安丘雹泉灵霈侯追封灵霈公”。卷一〇《世祖纪七》，第198页，至元十五年（1278）正月，“封磁州神崔府君为齐圣广佑王”；第204页，至元十五年（1278）八月，“制封泉州神女号护国明著灵惠协正善庆显济天妃”；第207页，至元十五年（1278）十二月，“封伯夷为昭义清惠公，叔齐为崇让仁惠公”；第212页，至元十六年（1279）五月，“丙子，进封桑乾河洪济公为显应洪济公”。卷一三《世祖纪十》，第267页，至元二十一年（1284）闰五月，“辛巳，加封卫辉路小清河神曰洪济威惠王”；第274页，至元二十二年（1285）二月，“加封桑乾河神洪济公为显应洪济公”。此条与“至元十六年五月丙子”条内容基本一致，原因不明。卷一五《世祖纪十二》，第313页，至元二十五年（1288）六月，“癸酉，诏加封南海明著天妃为广祐明著天妃”。卷二〇《成宗纪三》，第426页，大德三年（1299）二月，“壬申，加解州盐池神惠康王曰广济，资宝王曰永泽；泉州海神曰护国庇民明著天妃；浙西盐官州海神曰灵感弘祐公；吴大夫伍员曰忠孝威惠显圣王”。卷二一《成宗纪四》，第456页，大德七年（1303）十二月，“加封真武为元圣仁威玄天上帝”。

② 《元史》卷二四《仁宗纪一》，第537页，武宗海山卒于至大四年正月庚辰。据陈垣《二十史朔闰表》，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153页，至大四年正月初一日为癸酉，初五日则为丁丑，初八日为庚辰。

③ 《元典章》卷三《圣政二·崇祭祀》，“至大四年正月初五日”条。

④ 《元史》卷一一六《后妃二·顺宗昭献元圣皇后答己传》，第2900—2902页。武宗海山登位前，其母答己将海山和其弟爱育黎拔力八达（即后来的仁宗）二人的星命付于阴阳家推算，结果是海山登位则有灾而不长，爱育黎拔力八达登位则运祚长久。海山不惧阴阳家言而登位。此事又见于《元史》卷一三八《康里脱脱传》，第3321—3326页。

⑤ 水越知《元代的祠庙祭祀与江南地域社会——三皇庙与赐额赐号》。

⑥ 陈高华《元代的天妃崇拜》；刘月莲《妈祖信仰与元代漕运》。

1307) 浙西的海潮肆虐有关^①。元廷一直没有明确意识到诸神赐封可以有效加强对百姓的笼络而规定可为诸神请封。至此，至大四年诏书予以了明确允诺。虽然请封对象限定于“在祀典者”的范围之内，但南北各地经历了两宋几次大规模的加封之后^②，拥有入围条件的神灵为数极多。

至大四年诏书是民间信仰趋向活跃的反映，更是鼓励，但请封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徽州土神汪华的加封，历经歙县耆老王应和呈请、儒学申告、歙县照勘、池州路（今属安徽）总管府判官汪承直牒呈等繁复过程后，至大二年（1309）到了徽州路上呈的阶段，则其启动请封，不仅在至大四年诏书颁布之前，甚至可以回溯到成宗时期（1294—1307）。而该神的最终获封，在泰定二年（1325）^③。这一请封过程超过17年^④。浙江处州丽水丽阳庙的请封，始于延祐二年（1315），获封则在至顺三年（1332），亦历时18年^⑤。与此相佐证的是，《元史·本纪》显示，仁宗、英宗时期（1311—1323），除孟子、周敦颐等孔庙从祀者外，仅加封了屈原和诸葛亮^⑥，二者均属“忠臣烈士”。泰定帝时期（1323—1328）加封的频次则很高，包括解州盐池神、广德祠山神、宁国广惠王、温州平阳侯、庐陵江神、建德路乌龙山神、瑞州（治今

① 参阅〔元〕刘埙《隐居通议》卷三〇《天师退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元史》卷六五《河渠二·盐官州海塘》，第1639页。

② 〔日〕松本浩一：《宋代の賜額・賜号について——主として〈宋會要輯稿〉にみえる史料から》，野口鐵郎編《中国史における中央政治と地方社會》，东京，1986年度科学研究費補助金総合研究（A）研究成果報告書。该文对《宋会要》礼制部分中的诸神记载加以统计，认为祠宇以四川、福建、浙江最多，加封则以神宗熙宁（1068—1077）和元丰（1078—1085），徽宗崇宁（1102—1106）和大观（1107—1110），高宗绍兴（1131—1162），孝宗隆兴（1163—1164）、乾道（1165—1173）和淳熙（1174—1189）以及宁宗嘉定（1208—1224）年间最多。飯山知保《金元代華北における州縣祠廟祭祀からみた地方官の系譜——山西平遙縣應潤侯廟を中心に》一文认为，金朝的中原民间诸神几乎没有获得新的赐额和封号，其所拥有的封号停留在北宋末年的基础之上。因此，至大四年的在典诸神绝大多数都是在两宋时期获得封赐。

③ 宮紀子：《徽州文書新探——〈新安忠烈廟神紀實〉より》。

④ 《元史》卷四〇《顺帝纪三》，第861页，至正元年（1341）闰五月，“改封徽州土神汪华为昭忠广仁武烈灵显王”。据〔元〕郑弘祖辑《新安忠烈庙神纪实》卷三上《元申请追封表》所收江浙等处行中书省札付徽州路总管府的泰定二年加封圣旨，汪华改为昭忠广仁武烈灵显王实发生在泰定二年，至正元年只是请求另赐加封圣旨。这次请求加赐圣旨，始于元统二年（1334），亦历时8年。明成化元年（1465）汪公玉刻，正德（1506—1521）重修本。

⑤ 〔元〕冯德秀《重修丽阳庙记》，〔清〕李遇孙辑《括苍金石志》卷一〇；不著名《丽阳庙加封神号碑》，《括苍金石志》卷一一；危素《丽阳庙碑铭》，《括苍金石志》卷一二，《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15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

⑥ 《元史》卷二六《仁宗纪三》，第585页，延祐五年（1318）七月，“加封楚三闾大夫屈原为忠节清烈公”。卷二八《英宗纪二》，第622页，至治二年（1322）闰五月，“戊戌，封诸葛忠武侯为威烈忠武显灵仁济王”。

江西省高安市) 幸渊龙神、益都蒙山神、洞庭庙神和柳宗元等^①, 以南方神灵为多。这些请封, 当多始于江南趋向安定之后, 尤其是至大四年诏书颁布之后。

泰定帝时期封赐诸神较频, 亦源于此时相对宽松的封赐政策。泰定二年(1325)四月二十三日, 面对湖广、江西、江浙、陕西、山东等地数量众多的请封, 泰定帝君臣商议决定 “教礼部、太常礼仪院官人每定拟呵, 他每依着典故, 合加封的加封, 合改封的改封, 合创封的创封, 各另(“另”当作“令”——引者)明白定拟了有。”^②此处, “加封”, 即增加旧有封号的字数, “改封”, 即改变封号而字数不变, 二者均以旧有封号为基础 “合创封的创封”则意味着原来未膺褒封的非祀典之神亦可获加封。这种相对宽松的封赐制度无疑会进一步刺激民间的请封愿望。何况, 即使没有“创封”的动议, 民间的请封愿望也的确难以被圈定于“在祀典者”的范围之内, 各级地方官员也不会完全无视民间的热情而坚决阻抑非祀典之神的请封。因为可以想见, 在官民的祈祭活动中, 祀典之神不一定都灵验, 有时反倒是在灾情肆虐的情急之下祈祭非祀典之神时碰巧灵验了, 于是非祀典之神的请封变成官民的共同愿望。

7年之后, 至顺三年(1332)五月, “太常博士王瓚言 ‘各处请加封神庙, 滥及淫祠。按《礼经》, 以劳定国, 以死勤事, 能御大灾, 能捍大患, 则祀之。其非祀典之神, 今后不许加封。’制可”^③。“各处请加封神庙, 滥及淫祠”, 说明此时确有许多非祀典之神的请封材料递交到了太常礼仪院, 甚至还可推测, 早在泰定二年商议“创封”时, 已有不少这类材料在经过层层呈请和审核后抵达太常院, “创封”之议其实是在民间请封热情的推动下促成的。“其非祀典之神, 今后不许加封”, 说明此前确曾加封了非祀典之神。至顺二年(1331), 蒙古巫者所奉神灵被封为“灵感昭应护国忠顺王”, 其庙号“灵祐”^④, 说明赐封的确突破了“在祀典者”的限制。不过, 此系蒙古神灵, 或当别论, 但大量的非祀典之神的请封材料得以进至太常院, 足以显示民间请封愿望之强烈, 以及担负呈请、转递和核验任务的地方官员对“创封”规定的执行情况。

据笔者寡陋之识, 目前尚未见到汉地不具备前代褒封基础之神灵得以“创封”,

① 《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纪一》, 第643页, 泰定元年(1324)正月, “敕封解州盐池神曰灵富公”; 第644页, 泰定元年(1324)二月, “加封广德路祠山神张真君曰普济, 宁国路广惠王曰福祐”; 第649页, 泰定元年(1324)七月, “加封温州故平阳侯曰英烈侯”。卷三〇《泰定帝纪二》, 第675页, 泰定三年(1326)十一月, “加封庐陵江神曰显应”; 第682页, 泰定四年(1327)十月, “甲辰, 改封建德路乌龙山神曰忠显灵泽普佑孚惠王”; 第684页, 致和元年(1328)正月, “加封幸渊龙神福应昭惠公”; 第686页, 致和元年(1328)四月, “甲寅, 改封蒙山神曰嘉惠昭应王, 盐池神曰灵富公, 洞庭庙神曰忠惠顺利灵济昭佑王, 唐柳州刺史柳宗元曰文惠昭灵公”。

② 郑弘祖辑《新安忠烈庙神纪实》卷三上《元申请追封表》所收泰定三年(1326)江浙行省札付徽州路的泰定二年(1325)加封汪华圣旨。

③ 《元史》卷三六《文宗纪五》, 第804页。

④ 《元史》卷三五《文宗纪四》, 第775页。

相关学者亦持此见^①。这说明泰定二年（1325）至王瓚请求禁封非祀典之神期间，元朝并没有大规模实行“创封”。这也许与元朝没有制定相应的“创封”细则，太常院不好甄别而只能固守祀典有关。此后的顺帝时期（1333—1368），加封诸神仍在进行，还是以既有的祀典为基础。但只要加封不止息，民间的请封愿望就不会消歇。《元史·本纪》记载的最后一次诸神加封是至正二十二年（1362）加封唐抚州刺史危全讽为南庭忠烈灵惠王^②，其时抚州早在几年之前已非元廷所能控制的区域了。

由此，在元代中后期，地方社会一直有着较强的诸神请封气氛，至大四年诏书和泰定二年的“创封”动议尤其鼓励了民间的请封愿望。元末危全讽的加封说明抚州也具有这种气氛。金溪正属抚州管辖，与路治临川县毗邻。因此，尽管二孝女完全没有前代的褒封基础，金溪父老能够指着二孝女庙称“以未载祀典为今日阙事”^③，是因为在他们看来，既然许多非祀典之神的请封材料可以递入太常院，那么，申请二孝女入典也许并非只是奢望。

于是，在民间诸神请封气氛的推动之下，在银赋危险的重压之下，金溪的有识之士开始行动，力争使二孝女载入祀典。邑士危素对此最为用心^④。

危素（1303—1372），字太朴，金溪东部云林山中高桥人，少年时期常至县城^⑤，当比较熟悉二孝女祠。元统元年（1333）十一月，富州（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由丰城升格而成）金赋在历经波折后得以除免^⑥，危素应请作《富州蠲金纪事》。撰文过程中，危素明瞭了富州金赋的来龙去脉，知悉了富州人所受“数十年剥肤椎髓之

① 如水越知《元代的祠庙祭祀与江南地域社会——三皇庙与赐额赐号》：“由于元代如此重视祠庙在宋代的历史，可以说新兴起的祠庙均难以获赐封号。实际上自《元史》与庙碑等史料上的赐额、赐号的实例观之，大部分都是于宋代以前就已经获赐封号的祠庙，而在元代首次获封的祠庙数量非常之少。”

② 《元史》卷四六《顺帝纪九》，第962页。

③ 周自强《孝女图记》。

④ 目前所见元代金溪人所撰二孝女相关诗文，除胡元增、王经、刘杰因修祠所撰之文外，还有邑道士查居广的《二银女祠》（〔清〕顾嗣立编《元诗选》二集《壬集·学诗初稿》，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365页）和邑士罗微的《孝女祠》（王有年：康熙《金溪县志》卷一二《诗》）。查、罗二人在诗中只是传写故事，抒发观感，未见有扩大二孝女祠祀影响之意。

⑤ 危素《危太朴文集》卷六《平徭六策序》。

⑥ 《元史》卷三八《顺帝纪一》，第818页。富州金课得以蠲免，过程极其艰难，见危素《富州蠲金纪事》：“州人思脱其祸，若王季常、王元实等，往往开陈于有司。有思（“思”当作“司”——引者）稍集父老议，虽悉其敝，然莫肯固请于上……车（富州人揭车，揭傒斯从孙——引者）尝言于奉使宣抚，又言于监御史，号哭顿首，乞去民害，触御史怒，几得祸。赖龙兴路推官李崇德、莫维崇力争御史前，得免。至是乃言于张公（江西湖东道肃政廉访司金事张荣——引者）、全公（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全岳柱——引者），而张公、全公深哀其言，于是其事乃竟得闻，而州人数十年剥肤椎髓之害始一旦脱然矣。”其实还不止此。此前，揭傒斯在担任奎章阁授经郎时，借讲授《太平政要》之机，谈及州人金课之累，无果。揭车向张荣“言商琼妄兴金事不便”后，张荣令富州上报龙兴路和江西行省，廉访司同时上报，亦无果。全岳柱到任后，揭车又上言，加之廉访司牒文又上，全岳柱始将此事上报中央。再经过“户部议，须遣官核其实以报。明年夏，行省命龙兴路治中于某、临江路判官周某验得实，上之行省，复闻中书，而户部议如所言，蠲之便，于是命有司蠲之”。

害”，也体会到了鬻金历程的曲折艰难。在“于富州鬻金之政而重有感焉”^①之后，危素将此前的银赋紧张感化为清晰的责任感，开始致力于“摅发幽潜，捍卫乡井”^②，为争取二孝女进入祀典而努力。

经过考察之后，危素撰就了二孝女故事和祠祀的相关文本^③。他排除了故事中的不确定因素，明晰了故事情节，认定故事发生在唐代宝历年间，故事的主角是银场莅事者葛祐二女；二女愤而投冶后，化为二锭白银；监吏黄慷上报惨剧，血肉之躯化成的两枚银锭也被上缴至皇帝，皇帝遂下令免除金溪银赋。随后，危素详述了二孝女祠祀的相关情况。撰文过程中，危素增添了不少要素。这些要素或出自民间流传，或源于个人的主动添加，以致拟据危素提供的材料撰写《孝女传》的李存都提出疑问：“《孝女传》，在来春纳去，但化金一节，更宜考及；葛祐为何处人，二女之名谓何得，赐详示。”^④不知危素后来是否向李存作了解释，惟知李存的《金溪县烈女庙记》后来还是保留了“葛祐”之名和“化金一节”，只是略去了“二女之名谓”。危素规范二孝女故事的目的，意在使故事的教化性、经济性和政治性文化资源更加清晰，并突出其警示色彩，还通过祠祀沿革确定了其一贯的合理性。尤可注意的是，危素坚持李存颇持怀疑的“化金一节”，或在有意将二孝女故事引向神鬼的方向，以利于扩大二孝女对信鬼尚巫的民间普通百姓的影响力。

然后，危素开始持文广求文宗硕儒作记赋诗。此时的危素还只是活动在以抚州为中心，兼及信州（治今江西省上饶市）、饶州、龙兴、临江（治今江西省樟树市临江镇）一带的一介素儒。环顾周遭，其师清江范梈作为诗坛名家，已于至顺元年（1330）故去，崇仁大儒吴澄亦于元统元年（1333）辞世，富州揭傒斯正在京师翰苑任职，故旧浦江（今属浙江省）柳贯隐居乡里，均无法求文。但饶州安仁（今江西省余江县）还有元代“江东四先生”之一的李存居乡教授，文坛宗师虞集也恰在元统元年（1333）归老临川。危素遂首向李、虞二人求文。李存应请撰著《金溪县烈女庙记》，强调“是祠也，既未列于典祀，复无以纪其本末（“未”当作“末”——引者），甚可惧也”^⑤。虞集则在元统二年（1334）作《孝女赞》，肯定二孝女“身尽义著，苛政亦熄。民以永宁，无愧血食”^⑥。二人进一步增强了危素争取二孝女入典的决心，也为他向其他文宗硕儒求诗乞文提供了基础。

① 危素《富州鬻金纪事》。

② 吴师道《金溪孝女庙记》。

③ 危素此文已佚，但从吴师道《金溪孝女庙记》中“危君又能表诸文辞，俾好功献利者闻之，庶有警焉”之语可知，危素确有二孝女文本。下文所述内容系笔者据应危素之请而撰著的相关诗文归纳而成。

④ [元]李存《番禺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二九《又复危太朴书》，明永乐三年（1405）李光刻本。

⑤ 李存《番禺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一三《金溪县烈女庙记》。

⑥ 虞集《孝女赞》。

后至元四年（1338），危素携“震动江右”^①的声名、自撰诗集《云林集》、虞集所撰送行序^②以及李、虞二人的二孝女《庙记》和《赞》，北上大都，周旋于京中诸贵和雅士之间，声名日起，达官显宦“更相论荐，唯恐失之”^③。利用这一平台，危素积极开展扩大二孝女祠祀影响的工作。

他首谒参议中书省事苏天爵之门^④，后者应请作《跋金溪葛孝女赞》^⑤。随后相继有徽州婺源（今属江西省）程文作《葛孝女庙诗》^⑥，山阴杨维桢写《金溪孝女歌》，至正二年（1342）任国子博士的兰溪（今属浙江省）吴师道撰《金溪孝女庙记》，上元（今江苏省南京市）杨翮写《金溪县孝女庙乐歌》。以上诗文均是应危素之请而作。另有扬州成廷珪撰《金溪葛氏二孝烈女祠》^⑦，宣城（今属安徽省）贡师泰记《金溪县葛烈女庙》^⑧。成、贡二人的诗歌未直接说明与危素的关系，但二人均在危素的交流圈内^⑨，很有可能也是出于危素之请。以上诸人，无一不是当时的文坛名士。同时，身处京师的危素还心系家乡。至正元年（1341），他拜会即将离京赴任的金溪新任县丞尹大鹏，告之以二孝女祠祀。结果，尹大鹏下车伊始，便展敬祠下，倡修祠宇。

对于危素的这一列举动，吴师道称“乡之士危素犹惜其事之未白于世，请其友番阳李存记之，又求奎章阁学士虞公集赞之，名卿显人又诗歌之，由是孝女之名不独抚之人闻之矣”，肯定了在危素的努力下，二孝女祠祀影响的范围已然扩大。但吴氏同时指出“然典祀既崇，封锡未加。”^⑩危素的最终目的仍未达到。

至正二年（1342），危素被荐为经筵检讨，身登仕版，元末累官至翰林学士承旨。期间，他于至正十一年（1351）任太常博士，十五年（1355）为礼部郎中，十八年（1358）升礼部尚书，被时人誉为深谙礼制的“双璧”^⑪之一。太常礼仪院掌“大礼乐、祭享宗庙社稷、封赠谥号等事”^⑫，礼部职责中有“神人封谥之法”^⑬，因此，无论从地位，还是职掌，危素都有可能进一步推动二孝女荣膺褒封、进入祀典的

① 宋濂《宋学士文集》卷五九《故翰林侍讲学士危公新墓碑铭》。

②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三一《送危太朴序》。

③ 宋濂《故翰林侍讲学士危公新墓碑铭》。

④ 危素《危太朴续集》卷八《与苏参议书》。

⑤ [元]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二八，《元代珍本文集汇刊》本。

⑥ [明]程敏政《新安文献志》卷五一下《古诗五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⑦ [元]成廷珪《居竹轩诗集》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⑧ [元]贡师泰《玩斋集》卷二，摘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

⑨ 成廷珪《居竹轩诗集》卷一《兵部危太朴郎中家于临川云林山上请方壶作云林图太朴索诗赋此》；[元]赵贻《玩斋集序》，贡师泰《玩斋集》卷首。

⑩ 吴师道《金溪孝女庙记》。

⑪ 宋濂《故翰林侍讲学士危公新墓碑铭》。

⑫ 《元史》卷八八《百官志四》，第2217页。

⑬ 《元史》卷八五《百官志一》，第2136页。

工作。但是,从现有文献看,危素的努力没有成功,或者,他后来并没有朝此方向锲而不舍。终元之世,二孝女仍只是民间的祠祀对象。

究其原因,首先在于元代的诸神封赐强调前代的基础,虽有“创封”的动议,但基本上还是将非祀典之神排除于外。尽管在危素的努力之下,元代文人褒扬二孝女的诗文累牍连篇,终究无法替代申请所需的旧朝一纸赐封诰敕。

其次,即使元朝实行了大规模的“创封”,二孝女也不具备进入祀典的条件。对一般民间神灵而言,灵应与否是其能否获得封赐的重要条件。目前所见史料显示,元代的二孝女祠祀类似于乡贤祠祀,二孝女始终没有转化为普通民众祈福禳灾的灵异神鬼,其对普通民众影响不大。因此,即使金溪人着手请封,申请所需的灵异事实文册等材料也断难齐备。

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即二孝女祠祀尽管蕴含着统治阶层所提倡的道德,有利于社会教化,对贪利之徒也有警示作用,但当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发生冲突时,该祠祀背后的隐意是倾向于保护地方利益。这显然是高度中央集权且长期面临财政困境的国家所不愿大力弘扬的。

以上原因是初至京师的危素尚难意识到的,故广求诗文^①。在出入太常院和礼部并谙熟元代礼制之后,他该很清楚元廷对新兴神祠的政策。加之赴京之后,危素再未返乡,对乡井的关注度也许有所降低,而元朝在至正十一年(1351)又开始动荡,危素也许从此放弃了争取二孝女进入祀典的努力。而且,元末京中还有一批金溪士人,其中,黄昇任国子监丞、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官^②,刘杰任工部尚书、集贤院学士等职^③,王彰任国子助教、翰林编修、国子博士等职^④,曾坚累官至翰林直学士^⑤。他们与危素或为年少伙伴,或为同窗挚友,甚至是儿女亲家,都该或多或少地知道二孝女对于金溪的重要性。黄、刘诸人文集均佚,笔者无法知道他们是否有推动二孝女入典的举动,但即使他们有所作为,也不足以促使元廷改变诸神加封政策;再进一步说,即使诸神加封扩展至祀典之外,二孝女祠祀影响范围的有限和保护地方利益的倾向也将使其难以获封。最终,金溪人推动二孝女入典的努力以失败告终。

明代永乐元年(1403),金溪再次出现试采白银之事,二孝女故事仍具保护金溪

① 前述元代诸文人所作二孝女相关诗文中,李存和虞集之文作于危素远游大都之前,苏天爵称为危素为“危君”,程文称其为“邑士危太朴”,杨维桢称“危太朴有卷求余诗”,吴师道称“乡之士危素”,均可反映其时危素尚未入仕。杨翮文中未见危素之名,但其《金溪县孝女庙乐歌》乃是因“国子博士吴君师道既文之石,而祀神之诗阙焉”而作,故此乐歌当在至正二年(1342)吴师道作文后不久,危素可能仍未入仕,或者刚刚入仕。

② 《元史》卷一九六《忠义传四·黄昇传》,第4433页。

③ 吕杰、黎喆:弘治《抚州府志》卷二三《人物三·乡贤·刘杰》。

④ [明]王祚《王忠文集》卷六《送伯达王君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 宋濂《宋学士全集》卷一二《曾学士文集序》。

免受加赋危险的作用，故二孝女祠仍是“幽幽古庙生气存”，民间“岁时奔赴陈蔬葵”^①。进入清代，金溪全无银赋之险，二孝女名列贞孝节烈坊，显然只是发挥其弘扬孝道的功能。

不过，由于金溪人的努力，明清时期，二孝女的故事仍超越金溪一地而长久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中。清代姚之骥撰《元明事类钞》，收入贡师泰之诗，题作《烈女变》^②，《钦定续通志》收入杨维桢的《金溪孝女歌》^③，厉鹗还有“承安宝货铸即成，金溪孝女冶曾跃”^④之句。晚清民国时期编纂的《元史新编》、《元书》、《新元史》等书则因元代文人相关篇什甚多而将二孝女故事误载为发生在元代的事件^⑤。

五 结语

中国传统秉持着“孝为德本”的道德规范。纵观中国历史，孝女故事不绝于书，最著者莫过于会稽上虞（今属江浙省）的曹娥，其在宋朝熙宁十年（1077）十月受诏载入祀典^⑥，政和年间（1111—1118）又受封为“灵孝昭顺夫人”^⑦，元代后至元五年（1345）进一步加封为“慧感灵孝昭顺纯懿夫人”^⑧。放眼全国，孝女投炉救父的故事也绝非孤例。据《太平御览》，三国时期，吴国十五岁的孝女李娥之父为铸造军器的铁官。“一夕，炼金，竭炉而金不出。时吴方草创，法令至严，诸耗折官物十，即坐斩；倍，又没入其家，而娥父所损折数过千万”。李娥为救父而投炉，于是铁液流注二十里，收铁近亿万斤。后，“吴俗，每治铜铁，必先为娥立祠享而祈福”^⑨。江南著名的冶铜铸币中心梅根冶（故址在今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即有李娥庙^⑩，又称仙姑庙^⑪。清代直隶钱局奉祠“童女髻髻”，或与此有关^⑫。

① [明]王绍元《谒孝女祠》，王有年：康熙《金溪县志》卷一二《诗》。

② [清]姚之骥《元明事类钞》卷二六《珍宝门·银》，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清]嵇璜等《钦定续通志》卷一二七《遗声》，浙江书局光绪十二年（1886）刊本。

④ [清]厉鹗《樊榭山房集续集》卷七《吴氏家藏十三银凿落歌为蔚洲作》，《四部丛刊》本。

⑤ [清]魏源《元史新编》卷五二《列女一·葛孝女》，《续修四库全书》本；[民国]曾廉《元书》卷九四《列女传·葛孝女》，《四库未收书辑刊》本；[民国]柯劭忞《新元史》卷二四四《列女上·葛孝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徐氏退耕堂刊本，1989年。

⑥ [宋]沈作宾修，施宿等纂：嘉泰《会稽志》卷六《祠庙·会稽县》，《宋元方志丛刊》本。

⑦ [宋]张洙：宝庆《会稽续志》卷三《祠庙·会稽县》，《宋元方志丛刊》本。

⑧ 《元史》卷四〇《顺帝纪三》，第851—852页。

⑨ 《太平御览》卷四一五《人事部五十六·孝女》，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916页。

⑩ 袁士京《“梅根冶”考辨》，《东南文化》1990年第1期。

⑪ [明]王崇：嘉靖《池州府志》卷七《人物篇·贞烈》，《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

⑫ 魏源《元史新编》卷五二《列女一·葛孝女》。书中引苏天爵《跋金溪葛孝女赞》，并称“今直省钱局所供炉神祠，皆童女髻髻，即此事（金溪二孝女投炉事——引者）也。”即将钱局奉祠童女的原因归结为金溪二孝女。笔者以为此事可能与李娥的关系更大，有待今后继续关注。

曹娥地位的不断上升,与其事甚早,其祠甚灵,相关诗文,尤其是名家碑帖甚多不无关系。李娥受祠于钱局,当归因于其可提供冥助,使冶铸免于失败。二者共同的核心内涵均是孝道和灵异,均具教化和禳灾之功。金溪二孝女故事则与二者有别,内涵更丰富更正统,不仅有彰扬孝道的教化性文化资源,更有宣扬仁政、反对苛征的政治性文化资源和保护地方利益的经济性文化资源,已经上升到地方利益和国家利益关系的层面,从而成为对地方利益有着清晰的自觉意识的地方精英的扶立对象。所以,长期流传的二孝女故事一旦在地方利益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在地方精英的运作之下,其缄默状态就被打破,并借助各种文化表达,在不断的讲述、构建、传播、建祠和祭祀的过程中,其内在涵义和外在形式不断被规范,地位日渐稳固,影响日趋扩大。而在地方利益与国家利益不存在尖锐冲突的宋、明、清三代,其重要性便大大降低,处于可有可无的半蛰伏状态。这反映了民间信仰随着社会情势的变化而变化的生存和发展状态,也说明了在国家和地方发生利益冲突时,地方社会并非完全身处被动。地方精英们可以通过主动挖掘在一定程度上契合国家所提倡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尺度的地方文化资源,寻求地方利益的隐形保护,并通过延展这些文化资源的内涵,努力扩大其影响,以增强保护的力度。

金溪二孝女入典失败,固然与其缺乏前代的封赐基础和广泛的民间影响有关,但对于诸神封赐这样一种有效的社会渗透和控制手段,元朝主要采取“凡在祀典者,各具事迹申闻,次第加封”、“其非祀典之神,今后不许加封”的武断而恪守旧规的处理方式,相关的规定和程序多延续自宋代,受封的诸神也主要是承续宋朝的既有基础;面对民间基础深厚且日益活跃的诸神信仰,元朝自“世祖皇帝以来,封名号的不曾题”^①,即没有针对随着社会情势变化而相应变化的民间信仰制定相应的诸神封赐制度,换言之,元朝始终没有认真思考该如何有效利用民间信仰这一社会控制手段,这表明了元朝对于笼络和整合地方社会的某种程度的漫不用心。结合科举、任官等制度所体现的元朝对地方社会中坚力量缺乏有效的笼络手段,或许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深入分析元朝统治的社会基础问题。这是以后应当关注的课题。

(作者吴小红(女),1971年生,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

收稿日期:2010年4月20日

^① 郑弘祖辑《新安忠烈庙神纪实》卷三上《元申请追封表》所收泰定三年(1326)江浙等处行中书省札付徽州路总管府的泰定二年(1325)加封汪华圣旨。